

# “界”的虛與實：略論漢語新詞與晚清社會的演進

章 清\*

“~~界”在今日已是廣為使用的術語。作為現代漢語中頗為特殊的“後綴複合詞”（或稱為“接尾詞”），這樣的構詞法已預示其具有明顯的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往往成為考察語言成長具有特殊意義的例證。按照研究者的揭示，~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點、~觀、~線、~論、~率、~問題、~時代、~社會、~主義、~階級等，“都是從現代日語中借過來的，或是利用這種構詞法創造的”。<sup>1)</sup> 關鍵在於，這樣的構成法大大提升了語彙的製造能力，“後綴”之前添加什麼，決定於中國社會所做取捨；最終所形成的新詞，也未必與其語源有什麼關聯。今日學界針對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常常強調“語境”，就本土因素的作用來說，“後綴複合詞”無疑尤甚於其他外來詞，“~~界”也不例外。之所以基於“虛”與“實”展開討論，則是試圖就此一語詞的出現所經歷的曲折，略加說明。我們知道，“~~界”在歷史上的形態是佛教典籍中“世界”、“法界”及“十界”、“三界”之類的用法，其由“虛”走向“實”，則體現在走向“凡塵”，與“社會”的浮現有著密切關聯；也只有負載於“社會”才能彰顯其意義。<sup>2)</sup> 作為現代漢語新詞的“~~界”，出現於晚清中國“轉型”年代，也實際成為國家與社會形成新型對應關係的寫照。換言之，“~~界”由“虛”轉“實”並非無關宏旨，還成為把握中國社會演進的樞機所在。因此，這裏並不打算將問題的討論限於語言層面，還希望進一步檢討晚清接受“~~界”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將“語詞”置於近代中國思想演變的長程，檢討相關思想人物對此是如何進行闡釋的。這多少有些類似於“知識社會學”在研究某種思想方向時所確定的任務：關注社會進程對思想“視野”的滲透，通過重建它的歷史和社會基礎，以展示其在整個精神生活中的流布和影響範圍。<sup>3)</sup> 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示範”的對待歷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釋的特

---

\*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 王立達：《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辭彙》，《中國語文》總第68期，1958年2月。

2) 關於“社會”作為漢語新詞在中國的發展，可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5輯，2001年。

3) 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明“知識社會學”作為一種理論，它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係；作為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它試圖追溯這種關係在人類思想發展中所具有的表現形式。具體到語詞的討論則強調，“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樣的詞或同樣的概念，當處境不同的人使用它時，是指很不相同的東西。”見曼海姆著：《意識形態與烏托邦》，黎鳴、李書崇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278。

殊方式，也具有特別意義，提示我們從新的角度進入“概念”的分析。在處理現代歐洲早期出現的一些術語時，他就強調，“答案不在於規避這個名詞的使用，而在於將其用法儘量限於它最初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意義。”即在“比較古老而有限制的意義上加以使用。”<sup>4)</sup> 針對漢語新詞進行“歷史語義學”（“概念史”）的分析，近些年中國學界已有不少嘗試，漸漸在形成一些共識。<sup>5)</sup> 不可否認的是，進行“語義”分析的基礎是語言本身，既然作為漢語新詞的“～～界”有現代日語的背景，因此有必要首先對明治時期“～～界”的浮現加以分析。

### 一、“界”的引申意義在明治時期的浮現

言及“～～界”，很容易就聯繫到在19世紀文獻中頻頻出現的“世界”一詞。研究漢語的學者已指出，“世界”這個名詞是從佛經來的，本來涵蓋時間、空間，略等於漢語原有的“宇宙”。而且，佛經裏“世”和“界”的分別頗嚴格，“三世”指過去、未來和現在；“三界”則指欲界、色界和無色界。後來“世界”的意義到了大眾口語裏起了變化，“世”的意義消失，“界”的意義則吞併了“世”的意義，大致保存著“十方”的意思。<sup>6)</sup> 馬西尼（Federico Masini）所揭示的19世紀漢語外來新詞，也列有“世界”。指明此為來自佛教的漢語詞（源於梵語Loka的借詞），還強調“世界”一詞19世紀末作為從日語來的回歸借詞返回中國後才廣為使用，用來表示現代意義的world。<sup>7)</sup>

馬西尼對19世紀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只列出“世界”一詞，對“～～界”卻未加討論，這是有其原因的，實際上與“～～界”有關的漢語新詞，20世紀初才廣泛使用。研究者已注意到，清末民初時，受日本等外來因素的影響，漢語中曾出現了大量的後綴新名詞，其中“～～界”（文學界、思想界、藝術界、金融界、司法界、新聞界、教育界、出版界等），即是如此。<sup>8)</sup> 劉禾則將此歸於源自現代漢語的“後綴複合詞”，在“界”（world, circles）目下舉證的有藝術界、教育界、金融界、思想界、新聞界、司法界、文學界、出版界。<sup>9)</sup> 語言學者的研究，肯定了“～～界”乃現代漢語新詞，源自現代日語。

“界”之本義乃邊垂、邊境之意，按《說文》，“界，境也。”《爾雅》，“界，垂也。”在古漢語中大概表示界限、分界的意思。當然，就“～～界”來說，其歷史形態可追溯於中國佛教典籍中

4) 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上卷，奚瑞森、亞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頁3。

5) 這方面的研究參見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新史學》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此外，方對“文明”、“民族”、“經濟”等術語還有專門研究。

6)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593。

7) 馬西尼：《現代漢語辭彙的形成——十九世紀漢語外來詞研究》，黃河清譯，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7年，頁177；附錄2“十九世紀文獻中的新詞詞表”，頁240。

8) 除前引王立達的文章，還可參見實藤秀惠著《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頁331。實藤秀惠將“～～界”作為“中國人承認來自日語的現代漢語辭彙”。

9) 劉禾著：《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宋偉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附錄E“源自現代日語的前綴後綴複合詞採樣”，頁439。

廣為流行的所謂“世界”以及“三界”、“十界”之說。無論是古漢語中“界”的用法，還是宗教意義上的“法界”、“三界”等用法，作為近代以前進入日語的中文詞，在日語中都得到承繼。調查明治時代出版的相關書籍，也大致能瞭解這些用法都很普遍在使用。不過，變化也發生在這一時期，一方面，用以表示“全球”、“天下”意味的“世界”一詞，在明治初期即廣為流行，出版了不少直接以之命名的書籍。另一方面，在地域劃分上常常使用的“界限”，被用到討論政治問題的書中。受“自由民權運動”的推動，關注於政府權力的“界限”，以及政府權力與人民權利的“界限”，也成為普遍的用例。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界”逐漸用於自然領域與社會領域內的劃分。涉及自然領域出現了“自然界”以及“植物界”、“動物界”等用語，在天文學意義上也使用“太陽界”這樣的用語。而在明治20年前後，用以區分社會不同構成、不同界別的“～～界”，也已經較為普遍得到使用。《通俗将来の日本社会》一书，明显显示出过渡的痕迹，该书除总论外，其他回目分别检讨“政治的社会”、“宗教的社会”、“经济的社会”、“法律的社会”、“文学的社会”、“商业的社会”、“工业的社会”、“农业的社会”、“官员的社会”、“书生的社会”、“妇人的社会”、“医师的社会”、“教育的社会”。此明顯是將社會區分為不同的領域與不同的階層，只不過用以表達“社會”意義的“～～界”還不普遍，所以才會呈現這樣的情形。實際上，內中也用到“宗教界”，論及“未来の宗教界に処するの方途は如何”，且明显是以此涵盖佛教、耶稣教。<sup>10)</sup>此外，同樣顯示过渡痕迹的則是“經濟世界”、“金融世界”之類的表述。<sup>11)</sup>中江兆民著《四民の目ざまし》，不仅有专章讨论“実業世界の飢饉”，內中还同時使用“政治世界”与“政治界”。<sup>12)</sup>撇開“宗教”、“自然”領域的不談，單就社會領域而言，可以注意到“～～界”成為描繪“社會”的重要用語，成為“社會”提升的寫照。這一點尤其要緊，也構成現代漢語新詞“～～界”的要義所在。在下列書籍中，甚至在書名上或章節目錄上已使用“～～界”。詳見表一。

表一 明治時期出版的與“～～界”相關的書籍

書名	作者	出版機構	出版時間	對“界”的闡述
《社會進化論》	有賀長雄	東京：牧野書房	明20（1887） 增補	“無機界”、“有機界”
《政治界人士の心得：一語千金》	安西權五郎	中野村（神奈川県）：文明堂	明21（1888）	書名直接用到“政治界”
《通俗将来の日本社会》	中山整爾著	東京：春陽堂	明21（1888）	內中討論到“宗教界”，以此涵蓋佛教、耶穌教
《進化要論》	ハッケル著，山根梯三郎訳	東京：普及舎	明21（1888）	討論到“有機界”、“無機界”

10) 中山整爾著：《通俗将来の日本社会》，東京：春陽堂，明21（1888）。

11) 田口卯吉著：《經濟策》，東京：經濟雜誌社，明23（1890），頁103、493。此外還有“商業世界”的提法，見ゼー・エス・ミル著，ゼー・エル・ラフリン編，天野為之訳：《高等經濟原論》，東京：富山房，明24（1891），頁724。

12) 中江兆民著：《四民の目ざまし》，東京：博文堂等，明25（1892），頁88—89。

《平民政治》	ゼームス・ブライス 著, 人見一太郎訳	東京: 民友社	明22-24 (1891)	第五十八章 “何故に第一流の人物は政治界に入らざるや”
《東洋之立憲政治》	福田久松著	大田村(埼玉県): 福田久松	明24 (1891)	第十六章 “我が政界の悪弊を矯むるには先づ我が風俗を矯むべし”
《渾沌世界》	桑島蠶造	東京: 松英堂	明24 (1891)	按照 “政治界”、“経済界”、“教育界”、“宗教界” 安排章節
《青年と教育》	徳富猪一郎	東京: 民友社	明25 (1892)	主要討論到 “教育界”
《近世歐米歴史之片影》	徳富蘆花(健次郎) 編	東京: 民友社	明26 (1893)	提及 “商業界の奈破烈翁”
《パーク——三大革命巨人》	迎兵衛編訳	東京: 博文館	明26 (1893)	第一幼時より政治界に入る迄: 第二政治界
《経済界ノ警鐘》	的野半介等	東京: 的野半介	明26 (1893)	分別討論 “政治界”、“宗教界”、“哲學界”、“教育界”、“文學界”、“實業界”、“財政界”、“経済界”
《荻生徂徠》	山路愛山	東京: 民友社	明26 (1893)	分別討論其在 “文學界”、“思想界”、“政治界”、“教育界” 的影響
《解散と総撰挙: 政界革新》	野田剛編	東京: 民友社	明27 (1894)	書名即有 “政界”
《日清戦争ト経済社会》	進修太郎著	東京: 富山房	明27 (1894)	第七章 “戦争後ノ経済界”
《外国為替の説明》	富田源太郎著	東京: 富田源太郎,	明27 (1894) / 初版明24 (1891)	第十二章 “銀価下落の影響、我邦近時経済界の大勢”
《明治文學史》	大和田建樹著	東京: 博文館	明27 (1894)	(三) 其二 “小説界の繁昌”
《文學斷片》(國民叢書第5冊)	徳富猪一郎著	東京: 民友社	明27 (1894)	“文學界の怪事”(明治廿三年三月國民之友第七六号)
《吾家の憲法》	大月隆編	東京: 開新堂	明28 (1895)	第一(十三) “徳義を家の土台となし知識と政界を以て建物となすべし”
《支那処分案》	尾崎行雄著	東京: 博文館	1895	第三章第三節 “英国政界の変状”
《文學その折々》	坪内逍遙著	東京: 春陽堂	明29 (1896)	专节讨论 “宗教界”, 揭示 “明治二十六年文學界の風潮”, “明治二十七年文學界の風潮”
《清少納言》	緑亭主人著	東京: 民友社	明29 (1896)	开篇即论及 “清少納言以前の文界” 与 “清少納言時代の文界”
《日本國民の將來》	宮本基著	東京: 攻文堂	明31 (1898)	第二十節 “経済界の革新時期”
《條約実施卅二年後之新日本——萬國公法問答付》	後藤本馬著	東京: 文魁堂	明31 (1898)	第三章第一節 “現今の我商業界の状態”; 第四節 “我商業界の恐慌如何”
《教界の權利主義と自由主義》	リギョル著, 前田長太記	東京: 文海堂	明31 (1898)	書名用 “教界”
《試験と修養》	互理章三郎編	東京: 飯田書店	明31 (1898)	附録 “今日の学問界に処するの道を論じて青年諸士に告ぐ”
《海外貿易拡張論》	萩原利貞稿	東京: 日本經濟會	明31 (1898)	第六章第一款 “内地生産界の大改革”
《教育界之流行病》	リギョル述, 前田長太記	東京: 石川音次郎,	明32 (1899)	書名即用 “教育界”
《青年立志成業策》	平瀬竜吉著	東京: 岡崎屋書店	明32 (1899)	第七章 “教育界の二曉明星ベストロザーとフレーベル”

《津輕產業會沿革》	成田果著	弘前：津輕產業會	明32（1899）	第三“各地実業界に對したる事實”
《文學管見》	緒方流水著	東京：民友社	明32（1899）	讨论到“現時文界の傾向”
《警世評論：文學・美術・經濟・政治之觀察》	岡崎遠光著	東京：博文館	明32（1899）	第廿二章“思想界の神秘派及び自然派一瞥”

勾畫“~~界”的用例，只是略為展示明治20年前後日本出版物中的情況，有俾我們瞭解其普遍使用的情況。<sup>13)</sup>這也算得上“語境”，可以說明甲午之後湧入日本的中國學生，很容易就接觸到這方面的信息，並產生諸多“聯想”。至於何時出現，其中經歷過哪些曲折，語言學者已多有揭示。現代漢語中所存在的大量日語借詞，早已成為語言學者主要的關注對象，關注這些來自日本的借詞如何融入到現代漢語的語彙中。<sup>14)</sup>語言學者主要利用各種詞典以及書刊，以說明作為日語新詞的“~~界”大致是何時出現的；也透過《清議報》等出版於日本的報刊尋找在中文中最早出現的線索。論者即指明1881年出版的《哲學字彙》已列出有“礦物界”、“動物界”、“植物界”，還調查出在《清議報》上“~~界”的用例包括有“經濟界”、“思想界”、“政治界”、“宗教界”等。<sup>15)</sup>

## 二、中國思想人物對“~~界”的闡述

對日語中普遍流行的“~~界”略加梳理，便於更好瞭解晚清人士受到的影響。值得強調的是，既是作為“複合詞”，則“~~界”正類似於其他“複合詞”，其邊界往往是游離不定的。尤其是到了中國，在使用中還可能產生諸多組合起來的“新詞”。這些“新詞”不一定在日語中找到對應詞；甚至如過眼雲煙，未必會留下。不管情況如何複雜，既然在歷史中留下印痕，都可以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受容”過程中值得重視的因素。因此，這裏也不打算將問題的討論限於語言層面，而是希望進一步檢討晚清對“~~界”的表述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因為“~~界”在中文裏的出現，確包含著更為豐富的信息。

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界”在中文世界頻繁使用，而且，因為在日語的文本中已有各種用例，故此在中文世界也差不多同時湧現出來，難以區分先後。相關線索通常基於在日本創刊的《清議報》、《新民叢報》等刊物尋找，不過由於中日交流管道在此之前已建立起來，因此不妨在19世紀末創刊於上海、北京及湖南等地的報刊中去調查，或許可以發現零星的例證。1896年

13) 上述資料主要取自日本国会图书馆“近代デジタルライブラリー”資料庫。

14) 除前已述及各論著，這方面的研究還可參見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彙交流史》，笠間書院，1994年（2008年改訂新版）；荒川清秀：《近代日中學術用語の形成と伝播》，東京白帝社，1997年；陳力衛：《和製漢語の形成と展開》，汲古書院，2001年等。

15) 朱京伟：《『清議報』に見える日本借用語》，收入沈國威編著《汉字文化圈諸言語の近代語匯の形成—創出と共有》，关西大学出版部，2008年，頁129。

創刊的《時務報》，即是值得重視的報刊。<sup>16)</sup>應該說，該刊所出現的“租界”、“疆界”，甚至“國界”、“種界”，還是在古漢語“界限”的意義上使用，算不上“～～界”的用例。然而，該刊的“東文報譯”卻提供了“～～界”在中國較早之用例。“東文報譯”署“日本東京古城貞吉譯”，第5冊的一篇文章《論英國商務漸衰》（注明譯《東京日字報》西八月十八日）就有“商界”的用例：

英商多無學術，其從學校出者極少，他國多出新式，而英商猶排斥之，株守其舊式古例，頑然不動。皆由於商界之中，未遇勁敵故也，而不知今日非復疇昔也。<sup>17)</sup>

《時務報》之外，其他類似性質的報刊，同樣是值得調查的資源。梁啟超後來曾總結說：“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並且“《時務報》後，澳門《知新報》繼之，爾後一年間，沿海各都會，繼軌而作者風起雲湧，驟十餘家，大率面目總裁悉仿《時務》，若惟恐不肖者然。”<sup>18)</sup>這些報刊不少也有各種日本因素的影響，同樣值得重視。

既然“～～界”可能產生多種用例，這裏不妨透過梁啟超等人的文本，對此略作梳理。之所以選擇梁，原因無他，在晚清“思想界”（或者表述為“學界”、“報界”、“輿論界”），梁堪稱中心人物。他在20世紀初年所發表的一系列文字，正展現了“～～界”在晚清是如何被表述的。<sup>19)</sup>詳見表二。

16) 這方面的系統研究，可參見潘光哲：《開創世界知識的公共空間：〈時務報〉譯稿研究》，《史林》2006年第5期，頁1—18；沈國威：《古城貞吉與〈時務報〉的“東文報譯”》，收入氏著《近代中日辭彙交流研究：漢字新詞的創制、容受與共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363—402。

17) 古城貞吉譯：《論英國商務漸衰》（譯《東京日字報》西八月十八日），見《時務報》，第5冊，光緒廿二年八月十一日（1896年9月17日），“東文報譯”，頁23。值得補充的是，與“界”相關的用例，在《時務報》也有不少體現，也說明此問題糾葛著多重複雜因素，不易辨析。譬如，就在古城貞吉上篇文章中，也用到了“世界”一詞，指出“世界之大勢，已非昔比，而英人猶守其向日之習氣不肯少變，此漸衰之由也。”而在《時務報》第25冊刊發的梁啟超《論學校六》（“變法通義”三之六“女學”），內中即寫道：“彼西人之立國，猶未能至太平世也。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無國界，無種界，故無兵事，無兵器，無兵制。國中所宜講者，惟農商醫律格致製造等事。”見梁啟超：《論學校六》，《時務報》第25冊，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一日（1897年5月2日），頁3。

18) 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清議報》第100冊，1901年12月21日。

19) 表格資料取自：《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表二 梁啟超所表述的“~~界”

~~界	篇名	用例	時間/刊名
政界	《中國積弱溯源論》	吾嘗遍讀二十四朝之政史，遍曆現今之政界，于參伍錯綜之中，而考得其要領之所在。	1901年5月/《清議報》第80冊
新學界	《過渡時代論》	士子既鄙考據詞章庸惡陋劣之學，而未能開闢新學界以代之，是學問上之過渡時代也。	1901年6月/《清議報》第83冊
精神界/形質界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	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為其重也。	1901年6、7月/《清議報》第82、84冊
教界/學界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天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欲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	1901年10月/《清議報》第94、95冊
政界/詩界/報界/文字界	《〈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	……寫政界之大勢，……類皆以詩界革命之神魂，為斯道別辟新土。/思以此為我國報界進化之一征驗雲爾。/今請與閱報諸君一為戲言，斯亦可謂文字界中之得天最厚者耶？	1901年12月/《清議報》第100冊
學界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自此說（指盧梭《民約論》）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其（指托爾斯泰）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為之一變。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第1號
史界/思想界	《中國之舊史》	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第1號
政界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睹。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第1號
思想界/學界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紀時，古學復興，脫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于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	1902年2月/《新民叢報》第1號
學界	《論公德》	今世士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	1902年3月/《新民叢報》第3號
歷史界/自然界	《史學之界說》	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群學、平准學、宗教學等，皆近歷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自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自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	1902年3月/《新民叢報》第3號
思想界	《〈週末學術餘議〉識語》	屈子之厭世觀與其國家主義，亦實先秦思想界一特色也。	1902年4月/《新民叢報》第6號
生計界/學界	《論自由》	前世紀（十九）以來，美國布禁奴之令，俄國廢農備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矣。/吾故就團體自由、個人自由兩義，……演之以獻於我學界。	1902年5月/《新民叢報》第6、7號
平准界/政治界	《現今世界大勢論》	二十世紀之世界，雄于平准界者則為強國，奮于平准界者則為弱國，絕于平准界者則為不國。/今後之天下，既自政治界之爭，而移于平准界之爭，則我輩欲圖優勝，宜急起以競於此。……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稱雄者。	1902年5月/上海廣智書局
思想界/生計界	《論進步》	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而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生計界之競爭，是今日地球上最大問題也。	1902年6、7月/《新民叢報》第10、11號

學界	《政治學學理摭言》	俄國宗教總監坡鼈那士德夫氏，亦著論極攻政黨及議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動學界，夫多數幸福之優於少數，天經地義，無可辨駁者也。	1902年9、10月／《新民叢報》第15、18號
政治界/生計界	《干涉與放任》	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為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于生計界亦有然。	1902年10月／《新民叢報》第17號
學界	《西村博士自識錄》	其著書凡數十種，于德育智育，皆有功焉。偶檢此編，覺其言論多有適於吾國之用者，因隨譯一二，介紹諸我學界。	1902年10月／《新民叢報》第18號
小說界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1902年11月／《新小說》第1號
文界/新學界	《〈飲冰室文集〉原序》	先生之所以委身于文界，欲普及思想，為國民前途有所盡也。／是編或亦可為他日新學界真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1902年11月／上海廣智書局
文界/詩界/曲界/小說界/音樂界	《釋革》	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	1902年12月／《新民叢報》第22號
學界/思想界	《〈自由原理〉序》	彌勒約翰在數千年學界中之位置，如此其崇偉而莊嚴也。顧吾國人於其學說之崖略，曾未夢及，乃至其名亦若隱若沒，近數年來始有耳而道之。籲！我思想界之程度，可以悼矣。	1903年2月／上海開明書局
生計界/學界	《論私德》	並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國民，首推英美，次則日爾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于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後，而其氣焰始衰。	1903年10、11月／《新民叢報》第38-39號合刊及第40-41號合刊

以上列表所梳理的只是梁啟超1901—1903年間撰寫的部分文字，展示了“～～界”是如何被表述的。有一點是清楚的，這些用詞既來自於日本，也烙上中國的印痕。在讀書人寫作主要是文言文的時代，往往多用“～界”的簡稱，於是“政界”、“學界”、“文界”、“史界”、“詩界”等用語，也頗為流行。而且，梁對“～～界”的形成所具有的意義，似還沒有什麼“自覺”。沒有明確區分不同的“界別”，也未指明此對於中國社會具有的意義；尤其未能具體區分的“語境”，在描繪歷史與當下情況時，均不加區分加以使用。如梁所表述的“思想界”，即未加區分。內中所言“我思想界之程度，可以悼矣”，是對現實的描繪，其他的表述，無論是表彰“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還是哀歎“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或讚美古學復興“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均是對歷史的描述，似乎中國社會早已存在一個“思想界”。殊不知“～～界”用以描繪歷史，有的未必合適（詳後）。當然，用不著特別指明的是，梁所用的“～～界”，不少只是歷史的遺存，有的後來不再使用，有的則形成了更為通行的用語。

梁啟超之外，還可通過其他例證展現“界”是如何被表述的。楊度1902年在《遊學譯編》“敘”中，用到了“思想界”一詞，並且是對當下的描述。其言曰：“我國民若能發舒其固有之特性以競爭於思想界，使中國明年之現象，大異於今年之現象，朝夕異狀，以為世界之日日新聞，增異常之色彩，此亦豈待他求也哉？”對比法國大革命引發的變革，文章又以中國之“學術界”、“兵事界”、“政治界”、“文學界”進行對比：

試於我國學術界中，求一能為國民開自由之路索，為國家定許可權之孟德斯咎，為人群增進化之達爾文者誰乎？儒墨之儔，能當之乎？我國兵事界中，求一乘革命而起，遍播自由于全歐各國如拿破崙；率十三州之眾，一戰而立自由平等之國於新世界如華盛頓者誰乎？漢高、明太能當之乎？我國政治界中，求一以叢爾之撒爾尼亞，而成義大利統一之功如加富爾；以瀕亡之普魯士，而建德意志聯邦之業如畢士麻克者誰乎？管、晏、諸葛能當之乎？我國文學界中，求一能以文字喚起國民之精神，而使之獨立，如德之洛丁、英之意克里夫者誰乎？左、國、司馬能當之乎？然則我歷史之不如人，我國民之不如人也。<sup>20)</sup>

杜亞泉1903年發表於《科學世界》的一篇文章，本是論述“吾國植物學中，可謂黑暗已極”，卻推論說，“以現在言黑暗如是，以未來言艱難如是，推而至於全學界，至於政治界、經濟界、實業界，其黑暗與艱難，殆有甚於此者。”<sup>21)</sup>馬敘倫1903年發表的《日儒加藤氏之宗教新說》，系翻譯日本學者加藤氏的《宗教學新說》，內中也頻頻用到“思想界”一詞，既討論到“我邦思想界”，還揭示了“歐洲之思想界”的情況。<sup>22)</sup>柳亞子1904年發表於《江蘇》雜誌的詩作，其中一首也寫道：“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sup>23)</sup>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國維1905年發表的《論近年之學術界》，該文明顯是將晚清思想人物在“思想界”的架構進行評價：“近七八年前，侯官嚴氏所譯之赫胥黎《天演論》出，一新世人耳目。”然而，“嚴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論及進化論耳，其興味之所有，不存於純粹哲學，而存於哲學之各分科”，“此其所以不能感動吾國思想界也。”而伴隨法國18世紀之自然主義由日本介紹到中國，又激起學海波濤，“其有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于吾國思想界上占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瀏陽譚嗣同之《仁學》。”<sup>24)</sup>可以說，“~~界”已成為普遍的用詞。

尤其值得一說的是嚴復，和他人相比，其身份無疑是特殊的，他並沒有在日本生活、寫作的背景，然而，卻提供了受梁啟超等人的影響而接受“~~界”用語的例證。1902年2月創刊的《新民叢報》第1期“介紹新著”欄，曾介紹嚴復所譯《原富》一書，表彰之余，梁批評“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藉此也闡明“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的主張。此外，文中還頻繁用到“學界”一詞，因為嚴復曾表示對於此學，“欲譯最古者一書，最新者一書”，梁就表示樂觀其成：

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斯編之速卒業，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其所謂最新者之一書，吾更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他諸學科中最古最新者各一書。<sup>25)</sup>

20) 楊度：《〈遊學譯編〉敘》，《遊學譯編》第1期，1902年11月出版。

21) 杜亞泉：《普通植物學教科書序》，《科學世界》第2期，1903年5月。

22) 馬敘倫：《日儒加藤氏之宗教新說》，《新世界學報》1903年第2期。

23) 柳亞子（署名“亞盧”）：《歲暮述懷》，《江蘇》第8期，1904年1月17日。

24) 王國維：《論近年之學術界》，《王國維文集》第3卷，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頁36—37。

25) 梁啟超：《原富》，《新民叢報》第1號，“介紹新著”，1902年2月8日，頁113—115。

嚴復不僅看到了這篇文章，而且梁啟超所寄《新民叢報》前三期，他也收到，並對各期文章都有所回應。重要的是，嚴復在回應梁所提出的問題時，就明確闡明“文界復何革命之與有？”甚至表示：“若徒為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于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sup>26)</sup>很顯然，嚴復這裏所用“文界”一詞，乃襲用梁啟超的用語。有意思的是，對梁、嚴二人爭論文體問題有所回應的黃遵憲，1902年致函嚴復，同樣用到“學界”、“文界”。信中推崇嚴復說：“公於學界中，又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為天下法則，實眾人之所歸望者也。”還表示“公以為文界無革命，弟以為無革命而有維新。”<sup>27)</sup>

這些用例產生怎樣的影響，嚴復並未加以說明，可以明確的是，自此以後“學界”即在其論著及書信中頻頻出現。約在1902至1903年間嚴復致函張百熙，內中即多處提到“學界”，認為“私家譯著各書，互相翻印出售，此事於中國學界，所關非尠”，並表達了他的看法，如中國“鄭重版權，責以實力，則風潮方興，人爭自厲。以黃種之聰明才力，復決十年以往，中國學界，必有可觀，期以二十年，雖漢文佳著，與西國比肩，非意外也。”<sup>28)</sup>《群己權界論》1903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時，在“譯凡例”中，嚴復也寫道：“誰謂吾學界中，無言論自繇乎？”<sup>29)</sup>稍後，在所撰《〈袖珍英華字典〉序》中，嚴復一方面指出是書“一時號淵博，為學界鴻寶”，另一方面又肯定商務印書館排為袖珍之本，“於學界意良厚已”。<sup>30)</sup>聯繫上下文，可知嚴復所言“學界”，並未嚴格限定是在歷史的意義上還是當下的意義上使用。

結合梁啟超及其他晚清人物對“～～界”的表述，大致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作為漢語新詞，“～～界”的表述濫觴於晚清，已是無可置疑。不過，這裏也提示我們關注一個基本的問題，那就是“～～界”的內涵，未必都是很清楚的。大致說來，基於社會活動領域或職業進行命名的“界別”，如“政治界”、“生計界”，多少讓人清楚其所指；“史界”、“文界”、“詩界”之類，則關乎研究領域或體裁，也還算比較明確。然而，類似“思想界”（甚至包括“學界”）這樣的語詞，其內涵卻並不那麼清晰，無論是以職業來指稱，還是用研究領域來涵蓋，都尚有距離，顯得不是那麼回事。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問題，固然是因為“思想界”這一界別的職業特徵尚不明顯，同時也意味著“學”這一層面所遭受的劇烈震盪。而圍繞“學”劃分出這樣多的類別，並進行“界”的命名，則與斯時“分科”觀念的流行頗為有關。當時不少的雜誌，其欄目往往便著眼於分科，最為典型的是陳黻宸主持的《新世界學報》（1902年創刊）。該刊“取學界中言之新者為主義”，“以通古今中外學術為目的”，所設定的欄目均以“～學”或“～～學”命名，包括經學、史學、

26) 嚴復：《與梁啟超書》，收入王忞主編《嚴復集》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16。《新民叢報》第7號刊載了嚴復這篇答書，標題為《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目錄標為《與〈新民叢報〉論譯事書》），下標“壬寅三月”。見《新民叢報》第7號，“餘錄”，1902年5月8日，頁109—113。

27) 黃遵憲：《致嚴復書》，《嚴復集》第5冊，頁1572—1573。

28) 嚴復：《與張百熙書》，《嚴復集》第3冊，頁577—78。

29) 嚴復：《〈群己權界論〉譯凡例》，標明撰於“光緒二十九年”，《嚴復集》第1冊，頁134。

30) 嚴復：《〈袖珍英華字典〉序》，《嚴復集》第1冊，頁143—44。該文署“癸卯十一月”，當1903年12月19日至1904年1月16日之間。

政治學、法律學、宗教學、心理學、教育學、商學、兵學、農學、工學、理財學、倫理學、地理學、物理學、算學、辭學、醫學等學科，相應也設立了18個欄目。（詳另文）

這裏可以補充說明的是，何以要強調某些漢語新詞用以描述“歷史”未必合適。以“思想界”來說，在今日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字眼，針對古代中國思想的表述，就不乏“某朝（代）思想界”的提法。有必要強調的是，以往對歷朝歷代“思想界”的表述，皆來自後世的總結（這樣的表述是否合適且不論），晚清卻首次肇端了對“思想界”的表述，且意味全然不同。毋庸諱言，晚清對“思想界”的表述並不清晰，只是泛泛提及，未曾賦予“思想界”具體的內涵。關鍵還在於，“思想界”一詞，緊密配合於晚清的歷史，除與讀書人的角色聯繫在一起，還與表達的“載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謂“載體”，範圍自十分廣泛，但在晚清最值關注的無疑即是報紙雜誌，只有依託於這樣的“媒介”，才能夠形成所謂的“界”；所謂的“思想界”，也才能由“虛”轉為“實”。或許可以說，晚清之前所謂的“某朝（代）思想界”，所指即為“虛”，而在晚清之所以呈現出“實”的特質，關鍵正在於報章雜誌，以及大學、出版業等媒介呈現出“實”的特質。在這樣一個“舞臺”上，我們才能實際看到讀書人呈現出“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情形。<sup>31)</sup>

離開“出版物”，所謂“思想界”是難於把握的。到民國時期仍不乏讀書人對此的檢討，高長虹在一篇文章中因為討論到“出版界”，就頗有意思談到：

我們普通雖然也說什麼文壇，什麼思想界，實則仔細一考較時，才都是妄言妄聽，並沒有那麼一回事。為現在問你：‘文壇建立何處？’思想界在三界的那一層？則你必瞠目不能對答。因為這本來都是些錯誤的說法。即如你說文壇，實則說的只是這本詩集呀，那本小說呀，又一本雜感呀之類，你說說思想界，其實也只說的幾本書，或幾種定期刊物，此外便什麼也沒有。你說某人的思想如何，你並不看見他的思想，他也不能拿出他的思想給你，這其間所說的只是書報，即出版物是也。出版物是什麼？便是，有人寫出，有人印出，有人去看，為今便混名此寫，此印，此看，而稱之以出版界，所以範圍出版界的範圍是很大的。<sup>32)</sup>

“思想界”的“虛”與“實”，展示了一個漢語新詞有著豐富的內涵。對此做進一步的探討，或可以換一個面向關注“思想界”的成長。實際上，“政界”、“學界”、“生計界”、“文界”、“詩界”、“史界”及“思想界”差不多同時出現，對中國社會來說，確實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重要的是，當“~~界”明確指向當下社會的時候，它預示著這是用與以往不同的方式描繪中國社會。這正是本文接下來重點要討論的。

31) 這裏無法展開討論，參見筆者圍繞“思想界”討論的兩篇文章。《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份子新的角色探求》，收入《知識份子論叢》第6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203—234；《民初“思想界”解析——報刊媒介與讀書人的生活形態》，《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25。

32) 高長虹：《1926年，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收入氏著《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圖書局，1929年，頁84。

### 三、“～～界”作為社會轉型的象徵

在中日之間頻繁交流，尤其是漢字新詞創制的時期，兩個國家本處於不同的社會形態中，相應的，與社會密切相關的語詞，能否容易被理解或接納，也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別的且不論，如被語言學者列為明治時代新詞的“財界”（さいかい），在中國就少有使用，而是用“商界”來表達類似的意思。<sup>33)</sup>“～～界”在各種文本中頻頻出現（儘管還有些隨意性），實際成為一種象徵，預示著國家與社會形成新型對應關係後，中國社會在重新組織。在這個意義上，也有必要結合社會所呈現的“語境”關注漢語新詞的接受過程。事實上，所謂“～～界”，其意思既然指向社會的構成，則沒有對社會的重新認識，則負載於其中的詞也難有生存的空間；而結合本土的情況檢討此一新詞的運用，或許還能發現其所展示的有別於“語源”的特質。

晚清士人常常言及的“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在多個層面皆有所體現。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謂的“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大部分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sup>34)</sup>正點出了問題的關鍵。擯棄“天下”觀念，其潛在意義是接受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存在——“以國家對國家”；有了近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如何安排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等涉及政治生活的問題，才會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亦即是說，有了近代意義的國家觀念，中國社會也獲得了重新組織的契機。我們也看到，“～～界”在這個時期頻繁使用，正揭示出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深刻變動。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之一即是作為傳統社會精英的“紳”的特殊地位開始沒落，精英從此不再來自較為單一的社會階層，表達社會身份的新方式隨之出現。<sup>35)</sup>這也說明“～～界”，主要是指某一社會階層通過一定的關係“網路”組織起來。<sup>36)</sup>它所顯示的是，在擯棄天下大同理想而承認國家為最高政治實體後，中國讀書人致力於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起溝通紐帶。漸漸聚焦于“合群”這個涉及社會動員的中間環節，即顯示出集團力量的興起對於中國社會轉型具有突出意義。

這些問題，在19世紀末期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界關注的熱點。嚴復發揮達爾文生存競爭學說，將社會變遷理解為，“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尤其強調

33) 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明治のことば辭典》，東京堂出版，1986年，頁167。

34) 列文森著：《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鄭大華、任菁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頁87。

35) 論者注意到，通常被翻譯成集團或團體的漢語新辭彙“界”，如“政界”、“學界”、“商界”等等，是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事務性報導中出現的，這成為一種徵象，表明一個易於識別但外表相當鬆散的多中心的“亞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見蕭邦奇著：《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周武彪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4。

36) 筆者也曾立足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對此有所討論。集團力量興起涉及的是社會動員方式的轉變，是在國家與個人之間建立一種紐帶。檢討讀書人聚集方式的轉變，以及“省界”、“業界”、“階級”等“亞文化圈世界”的形成，有助於揭示讀書人在形成集團力量時值得注意的一些特性。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群學治，而後能修齊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進于郅治馨香之極盛也。”<sup>37)</sup>康有為也講到，“中國風氣向來散漫，士夫戒於明世社會之禁，不敢相聚講求，故轉移極難。思開風氣、開知識，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後力厚也。”他本人也突破“社會之禁”，以“學會”號召于京師。<sup>38)</sup>梁啟超則看到了西方國家“合群”的基本方式在“議院”、“公司”及“學會”（“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他為中國政治變革所尋找的出路，即是學會，“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欲興紳權，宜以學會為之起點。”<sup>39)</sup>

嚴復值得重點說說。在從事翻譯過程中他頗早就涉及此一問題，如在翻譯《原富》所加按語中，其中一則就這樣寫道：

按：此所謂聯，西名歌頗魯勒憲。猶中國之云會，云行，云幫，云黨。歐俗凡集多人，同為一業一事一學者，多相為聯。然與中國所謂會、行、幫、黨，有大不同者。蓋眾而成聯，則必經議院國王所冊立，有應得之權，應收之利，應有之責，應行之事，四者缺一，不成為聯。……故西國有學聯，各國國學皆由此起。有教聯，教門之事自律自治，於國家無與也。有鄉聯，凡鄉、凡邑、凡屯、凡屬地，皆有之。相時地之宜，而自為律令，與國家大法有異同。而其地之土功水利井裏巡兵，多為所獨斷者，今中國各步租界所謂工局者，猶此制也。有商聯，如印度大東公司，及今之滙豐鈔商，皆屬此。有工聯，則如此篇所指是已。其事與中土之社會差同。而規制之公私，基業之堅脆，乃大有異。故其能事，亦以不同。此所以不能譯之為會，而強以聯字濟譯事之窮焉。<sup>40)</sup>

所謂“歌頗魯勒憲”，乃“corporation”的英譯，今譯公司、社團、法人等，乃社會之基本組織形態之一。在別的地方，嚴復又進一步說明：

業聯之所以病國，在辜權把持，使良楛無異也。使其立之約束，為一地之公利，不許賈偽售欺，則亦未嘗無益也。今如閩之茶葉，人得為賈，而小民怵於一昔之贏，往往麁雜穢惡，欺外商以邀厚利，貽害通業所不顧也。二十餘年來，印度茶葉大興，而閩之茶市，遂極蕭索。向使其地業茶大賈，會合為聯，立規約、造商標，令茶之入市，雜偽者有罰，使賈茶之家，久而相繼，則閩之茶品，固天下上上，足與印茶為競有餘，未必不收已失之利也。<sup>41)</sup>

37) 嚴復：《原強》，《嚴復集》第1冊，頁5—15。

38)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第4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年，頁133。

39) 梁啟超：《論學會》，《時務報》第10冊，1896年11月5日。

40) 《原富》按語，《嚴復集》第4冊，頁864—65。1897年嚴復就著手翻譯此書，到1900年全部脫稿，1901—1902年全書陸續由張元濟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

41) 《原富》按語，《嚴復集》第4冊，頁866。

在翻譯《社會通詮》等著作時，涉及合群問題，嚴復也倍感“援西入中”的困難。他曾表示：“從眾之制行，必社會之平等，各守其畛畔，一民各具一民之資格價值而後可。古宗法之社會，不平等之社會也。不平等，故其決異議也，在朝則尚爵，在鄉則尚齒，或親親，或長長，皆其所以折中取決之具也。”關鍵正在于，東西立國根本相異，“而國民資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sup>42)</sup> 翻譯《群學肄言》之後，在“譯餘贅語”中，嚴復同樣看到理想的國家是基於“社會”進行組織，“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數等，社會者，有法之群也。社會，商工政學莫不有之，而最重之義，極于成國。”<sup>43)</sup>

這裏引出的問題值得思考，重要的倒不是如何翻譯的問題，而是表明在從事翻譯工作時，嚴復不得不面對如何“合群”，即“社會”如何構成的問題。而他所面對的都是西方架構下的社會分層，尤其體現在與國家分權的社會組織，但在中國，即便同樣有幫、有會，卻與之大異其趣。這樣的問題不僅困惑嚴復，也困惑黃遵憲諸人。<sup>44)</sup>

內中所發生的最顯著的轉變，便是中國社會的組織方式逐漸圍繞“業界”展開。所謂“業界”，在晚清即主要通過“～～界”的形式表現出來，並成為“亞文化圈世界”形成的基本標誌。以讀書人的聚集來說，最初的聚集往往憑藉“地緣”因素。中國人濃郁的“同鄉”觀念，也是學界所津津樂道的話題。<sup>45)</sup> 實際上，正是“鄉黨”觀念（即這裏所說的“省界”）成為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最初的誘因。而其所依託的，即是分佈於各城市的商業類會館和士人會館。在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形成集團力量另一個重要管道——日本，也印證了這一點，實藤惠秀就注意到，留日學生生活也是中國國內的縮影。他們赴日留學之時，是以省為單位被派遣的（並由各省在日本設立

42) 《社會通詮》按語，《嚴復集》第4冊，頁928。

43) 嚴復：《〈群學肄言〉譯餘贅語》，《嚴復集》第1冊，頁125—26。

44) 黃遵憲《駁革命書》是較早涉及“合群之法”的文字，提出了“合群之道，始以獨立，繼以自治，又繼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實力，有善法”。從一開始，中國本土資源的匱乏就顯露無遺，“前王先聖所以諄諄教人者，於一人一身自修之道盡也，于群學尚闕然其未備也”。在黃看來，中國合群之法“惟族制稍有規模”，然“仁至而義未盡，恩誼明而法制少”。其他如同鄉、同僚、同年，以及相連之姻戚、通譜之弟兄者，則不過是“勢利之場，酬酢之會”。“合群之最有力量，一唱而十和，小試而輒效者，莫如會黨”，其結果卻也令人憂慮，“貽害遍天下，其流毒至數世而猶未已”。因此，黃遵憲提出講求“合群之道”，“當用族制相維相系之情，會黨相友相助之法，再參以西人群學以及倫理學之公理，生計學之兩利，政治學之自治，使群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後可進民權之說。”見黃遵憲：《駁革命書》，《新民叢報》第24號，1903年1月13日。

45) 列文森就曾立足於此檢討中國的“認同”問題。Joseph R. Levenson, “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Albert Feuerwerker etc.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268—88. 施堅雅則提出，大部分中國人想到中國的疆域時，是從省、府和縣這一行政等級區劃出發的。根據行政區域來認知空間在明清時尤其顯著，人們往往用行政地域來描述一個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的關鍵因素。見施堅雅主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葉光庭等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中文版前言”，頁1。何炳棣還解釋了中國人（特別是士大夫）“同鄉”觀念很強的緣由：譬如在習俗上甚至法律上的極重孝道，加強了人們與籍貫地的聯繫；再譬如以地區為基礎的考試制度，官員要回避到原籍所在省份任職地法規，全國性的地方學府制度等因素，也時時起着揭示作用，提醒人們個人的依靠還是牢牢根植於出生之地。見何炳棣：《中國會館史論》，臺北學生書局，1966年，第1章。

留日學生監督)；抵達日本後所去的第一個公共場所，差不多都是各地的同鄉組織。最明顯的是，留日學生主辦的雜誌，亦多以省份為名。<sup>46)</sup>這一點也為其他人所觀察到，如鄒魯所說的，“時各省學生皆有學生會，會中多辦一機關報。”<sup>47)</sup>包天笑在回憶中也道及這一點，由於日本的印刷發達，刊物容易出版，於是那些留日學生，便紛紛辦起雜誌來，而由於“中國各省都派有留學生到日本，他們的雜誌，也分了省籍。”<sup>48)</sup>以《浙江潮》的創辦來說，即是依託浙江同鄉會而成（編輯兼發行者均署“浙江同鄉會”）。其《發刊詞》開篇即謂，“歲十月浙江人之留學于東京者百有一人組織一同鄉會。既成，眷念故國，其心惻以動，乃謀集眾出一雜誌，題曰《浙江潮》。”<sup>49)</sup>

約在1903年前後，破除“省界”的呼聲也漸漸浮現。1903年《浙江潮》所刊登的《非省界》一文，即闡明“自省界之說起，而國界種界反退處於若隱若現、似有似無之間。”甚至還表示，“吾頗聞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壞者，我獨謂，欲破壞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壞省界。”<sup>50)</sup>原本是同鄉會刊物的《浙江潮》提出“非省界”問題，無疑說明“省界”問題之嚴重。文章闡明了所以要破除“省界”，是基於“國界”、“種界”的立場；不獨“省界”，連“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俱在破壞之列，則表明“業界”意識已流行開來。由“省界”到“業界”，正展現了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重新組織的新氣象。破除“省界”之提出，是對“省界”意識濫觴的直接反應，而差不多同時，“業界”意識也逐漸產生。如鐵郎在《二十世紀之湖南》中，先是竭力讚揚一番湖南，繼則表示湖南受到各省人的排斥，“江南之將備學堂，以嫉湖南人幾於解散矣。老湘營見忌於廣西；武備生受沮於湖北。各省政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喜生事端也。’軍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最占勢利也。’學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太無程度也。’商界、工界乃至妓界之排湘者，曰：‘湖南人性太野蠻也。’”<sup>51)</sup>這是將省界與“政界”、“軍界”、“學界”等業界對舉，顯示出近代中國集團力量形成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趨向。同樣創刊於1903年的《湖北學生界》，單從名稱即可看作由“省界”向“業界”過渡的產物。

這裏並無意說明“省界”與“業界”存在替代的關係，儘管破除“省界”之呼聲不絕如縷，未必即能破除。而要明確給出“業界”形成的標誌，也是困難的。不過“業界”逐漸成為社會動員的標誌，卻有據可尋。《順天時報》記載了1910年北京各界爭相聽戲壇新寵王鐘聲的盛況：“九

46) 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譚汝謙、林啟彥譯，北京三聯書店，1983年，頁52、423。

47) 鄒魯：《中國同盟會》，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頁7。

48)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3年，頁161。

49) 《〈浙江潮〉發刊詞》，《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17日。參見同期所刊《浙江同鄉會簡章》。

50) 因為內地一位讀者致書浙江同鄉會，“憂省界之日厲”，引起作者的同感。文章這樣寫道：“省界胎于庚辛之間。廣人《新廣東》出世，省界問題，如花初萌。于時各省同鄉懇親會，後先成立。承流附風，遂遭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詞已定矣。來東土者，浸淫渲染，已成習慣。人人心中，遂橫一大梗蒂，聞一議，接一人，遇一事，談一語，必首相叩曰，是何處人，何處人。雖以平日之舊交，兒童之昵友，必有一畫然不可合併之勢。于乎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入其社會，審其內容，則陰霾沈沈，戈矛森立。要之，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捲入此陣雲之中。”文詭：《非省界》，《浙江潮》第3期，1903年3月20日。

51) 鐵郎：《二十世紀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二），頁195—208。

城裏外，舉國若狂，接連幾晚上，不論商界、學界、政界、女界、守舊界、維新界中人，凡知道鐘聲消息的，都要破點工夫，犧牲數時間，到大觀園去聽鐘聲。”<sup>52)</sup>此明顯是以“界”來描繪各社會階層。尚可舉證的是同年《雲南》雜誌發表的一篇文字。該文為滇越鐵路事發出警告：“誰非滇人？誰無責任？……惟統一吾滇議員、學界、紳界、商界、軍界、實業界千萬人為一心，目光所射，射在贖路，心血所注，注在贖路，口所談者，談贖路策。以贖路為職業，以贖路為生活。精神所貫，何事不成？”<sup>53)</sup>其言說的對象實包括了“學界”、“商界”、“紳界”、“實業界”、“軍界”。

這方面最為突出的展現，是刊物的欄目多按“界別”來組織文章。較多涉及的包括“學界”、“政界”、“商界”、“軍界”、“民界”、“醫界”、“女界”、“出版界”、“教育界”、“留學界”、“實業界”等。《譯書彙編》、《浙江潮》、《江蘇》等刊物，都設有“留學界”這一欄目。《新民叢報》最初有“詩界潮音集”、“史界免塵錄”，後又增設了“政界時評”、“學界時評”欄目。這還不算什麼，1906年由留日學生創辦的《新譯界》，全是按照“界別”來安排欄目，包括“政法界”、“文學界”、“理學界”、“實業界”、“教育界”、“軍事界”、“外交界”、“時事界”等，聲稱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一變吾國政法界為極良政法界；二變吾國文學界為絕妙文學界；三變吾國理學界為最精理學界；四變吾國實業界為至足實業界；五變吾國教育界為完美教育界；六變吾國軍事界為強大軍事界；七變吾國外交界為靈敏外交界；八變吾國時事界為光榮時事界。”<sup>54)</sup>而直接以“界”作為雜誌名稱的，除前述《湖北學生界》、《新譯界》，尚有《實業界》（1905年）、《中國新女界雜誌》（1907年）、《鐵路界》（1910年）等。商務印書館自1897年創辦以來，陸續出版了不少刊物，所針對的受眾，涵蓋各不同的社會階層，包括性別、年齡及職業的區分，明顯是針對不同的“界別”爭取受眾。<sup>55)</sup>民初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八大雜誌：《大中華》、《中華教育界》、《中華實業界》、《中華學生界》、《中華婦女界》、《中華童子界》、《中華小說界》、《中華兒童畫報》，也醒目突出了“界”的色彩。<sup>56)</sup>

52) 《順天時報》1910年1月29日，轉引自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9。

53) 義俠：《為滇越鐵路告成警告全滇》，《雲南》第19期，1910年3月。

54) 《發刊詞》，《新譯界》第1號，1906年11月。此據壽從肅所寫介紹《新譯界》的文章，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03—14。

55) 有關商務的定期刊物，1929年的一份資料有大致的說明：“本公司除慎重編印教科書外，並出版定期刊物多種，以為提高本國學術地位，增進國民知識程度之助。討論時政提倡學術者，則有《東方雜誌》；研究教育以促進步者，則有《教育雜誌》；謀國內學生界交換智識會痛聲氣者，則有《學生雜誌》；謀增進少年及兒童普通知識者，則有《少年雜誌》、《兒童世界》及《兒童畫報》等；討論婦女問題者，則有《婦女雜誌》；謀增進學生英語智識者，則有《英語週刊》；研究中外文學者，則有《小說月報》；研究中國自然物及自然現象者，則有《自然界雜誌》。無不以內容豐富，材料新穎，見稱于國內外之讀者。此外，國內各學術機關定期刊物由本公司發行者，有《學藝》、《美育》、《民鐸》、《農學》、《史學》、《與地學》等，茲不詳贅。”如算上此前出版的一些雜誌，尤其是代為發行的雜誌，這個名單還要增加不少。《商務印書館志略》，1929年7月印，頁32。

56) 上述報刊欄目資訊主要依據前述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還參考了上海圖書館編《中國近

同樣說明問題的是，1913年出版的《中國新術語》，在“界”一欄下對此還有所歸納，收有“警界”、“權界”、“軍界”、“法界”、“學界”、“官界”、“工界”、“空界”、“伶界”、“男界”、“女界”、“報界”、“色界”、“商界”、“紳界”、“省界”。<sup>57)</sup> 1917年出版的《官話辭典》，在“world”詞條下，還收有“The commercial world”（“商界”，標注新）、“The official world”（“官界”、“官場”）。<sup>58)</sup> 據此似可說明，伴隨中國社會的重新組織，中國逐漸形成以“業界”相號召的社會。

不難看出，晚清以降作為現代漢語新詞的“~~界”的流行，實際構成社會分層的重要標識。前已言及，在日語中頗為流行的“財界”，在中國鮮少使用，同樣令人矚目的，則是據此造作出諸多富於中國本土特色的新詞。所謂“紳界”、“官界”乃至“商界”之類，一看便知是傳統社會身份標識的沿襲；而所謂的“維新界”、“守舊界”以及五四時期流行的“青年界”、“老年界”等符號，則來自本土的“聯想”。不管怎麼，“~~界”的流行是不爭的事實，不僅解決了社會分層的問題，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尤其是進入現代政體的嘗試之際，“業界”也成為主導的力量之一。

#### 四、“~~主義”具有的參照意義

語言學者所列出的“後綴詞”或“接尾詞”，除“~~界”外，還包括有“~~主義”、“~~學”等，就這類詞來說，無疑更具游離性和不確定性；其“歷史性”過程也有更多值得重視的地方。“~~界”在晚清中國的浮現，就極富意味地顯示出超越語詞本身的一面。我們甚至可以說，其詞源是否來自日語變成次要的問題，反倒是晚清讀書人運用此一語詞重新認識中國，更值得重視。此亦說明，對語言“受容”的研究，或許可以更多結合歷史的“語境”來展開。為便於問題的說明，不妨再就“~~主義”稍加補充。<sup>59)</sup> 原因在於，“~~界”展示出晚清社會重新組織的一面，而“~~主義”則將思想界的選擇機制有更為充分的展現，這同樣是檢討現代漢語新詞值得重視的一環。

“~~主義”，也是語言學研究者頗為重視的。研究者揭示了，相當於西方語言中的“-ismus”或“-ism”，即表達“原則”、“學說”之意味的“主義”一詞，在日語中是由Nishi Amane 於 1872—1873年首次使用的——表述為“shugi”。而且，“早在明治早期，‘shugi’一

代期刊篇目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史和、姚福申等編《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

57) Evan Morgan,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 and Notes*, Published at C. L. S. Book Depot, Kelly & Waish, Limited Shanghai, 1913. pp. 193—94.

58) K. Hemeling,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官話)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917). pp. 1645—1646. 該書注明“Based on the Dictionary of the late G. C. Stent, published 1905 by the Maritime Customs”。

59) 章清：《“國家”與“個人”之間——略論晚清中國對“自由”的闡述》，《史林》2007年第3期。

詞附於其他詞根之後，用以說明所指事物是一種理論或主義的用法已司空見慣。”<sup>60)</sup> 沈國威曾對比“主義”一詞在各種詞典中的表述情況。詳見表三。<sup>61)</sup>

表三 “主義”一詞在詞典中的表述情況

	《英華字典》	《大辭典》	《官話》	《綜合》
1. principle	原、理、道理	主義	主義	主義
2. doctrine	道、道理	所教、主義	主義	主義
3. -ism	未收	~~主義	未收	主義

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主義”一詞即在漢語思想界廣為流行。有必要提示的是，“主義”的流行，已非單純的“翻譯”過程。甚至可以說，“翻譯”實際退居次要位置，“主義”作為“後綴詞”，寄託的是明確的訴求。戊戌維新之後，流亡日本的康有為、梁啟超所創辦的《清議報》，就明確表示，“本報宗旨專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主義。”<sup>62)</sup> 1900年創刊之《開智錄》，也“以爭取自由發言之權，及輪進新思想以鼓盈國民獨立之精神為第一主義。”<sup>63)</sup>《遊學譯編》成，同人屬楊度弁辭於其首，楊度也將所表達的見解，自“學術第一”至“小說第十二”稱之為“主義”。<sup>64)</sup> 可以看出，說是“主義”的流行，實際上哪里是什麼“主義”，往往是一些主張，也以主義相標榜。1908年徐佛蘇致函梁啟超，就有這樣的話，“弟對於社中近來有兩大主義，一則當急搶實權，一則當急改選。”<sup>65)</sup>

問題的關鍵仍然是，“主義”之氾濫，與中國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讀書人是立足于社會組織與社會動員的需要表現出對“主義”的濃厚興趣。《大同日報緣起》就說道，“泰東西名哲之言曰：凡欲興國強國者，必有會黨，必賴會黨。無會則無團體，無黨則無主義。”<sup>66)</sup> 這清楚交代了“主義”發端於怎樣的論述方式，以及如何在新的集團力量形成過程中被定位。一篇討論歐洲

60) 余又蓀：《日譯學術名詞沿革》，《文化教育旬刊》第69—70號，1935年。不過李博也指出，“shugi”也並非自由新造詞，而顯然是仿效古漢文中的一個片語而造的。見李博：《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趙倩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頁118—19。

61) 對比的辭典包括：《英華字典》（羅存德，1866—1869年）；《英華大辭典》（顏惠庆等，1908年）；《官話》（1916年出版）；“綜合”則系參照日本的几种辭典，包括《日本模範新英和大辭典》（《大增補模範英和辭典》，1916年，神田乃武編）、《井上英和大辭典》（《井上英和大辭典》，1915年，井上十吉）、《齋藤英和中辭典》（《熟語本位英和中辭典》，1915年，齋藤秀三郎）見沈國威：《近代日語彙交流史——新漢語の生成と受容》（改訂新版），日本東京笠間書院，2008年，頁207。

62) 《本報改定章程告白》，《清議報》第11冊，1899年4月10日。

63) 《開智會錄緣起》，《開智錄》“改良第一期”，1900年12月21日。此據陳匡時整理校點《開智錄》（上），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4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331。

64) 楊度：《遊學譯編》敘，《遊學譯編》第1期，1902年11月出版。

65)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465。

66) 《大同日報緣起》，張枏、王忍之前引書，《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頁361。

“三大主義”的文字，還明確指出，世界各國所發生的變革，“皆無一非有大願力大主義存乎內，無一非國民同心協力不顧萬死以達之者也。”<sup>67)</sup> 這個意思，在梁啟超給康有為的信中，作了更明確闡述。事關改保皇會為帝國憲政會，梁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東西各國之言政黨者，有一要義：曰黨於其主義，而非黨於其人，此不刊之論。而我今日欲結黨，亦必當率此精神以行之者也。今此報告文全從先生本身立論，此必不足以號召海內豪俊也。”<sup>68)</sup> 這也點出了20世紀初年“主義”流行的背景所在，是與中國社會“合群”意識的提升密切相關。

梁啟超堪稱那個年代闡述“主義”的“典範”。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種主義開始在其言說中頻頻出現，尤其是在1898年12月23日創刊的《清議報》上，有多篇文章談到“主義”。《破壞主義》一文即謂：“日本明治之初，政府新易，國論紛紜。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井上馨等共主破壞主義，又名突飛主義，務摧倒數千年之舊物，行急激之手段。”<sup>69)</sup> 在一篇《答客問》中，又有這樣的內容：

客難任公曰：子非祖述春秋無義戰，墨子非攻之學乎？今之言何其不類也。任公曰：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今中國岌岌不可終日，非我輩談將來、道理想之時矣。<sup>70)</sup>

在種種“主義”氾濫之際，其他刊物也有所闡述，《開智錄》與《遊學譯編》即是對各種“主義”多有闡述的刊物。《開智錄》自首期即開始連載日本大井憲太郎所著《自由略論》，這篇文章提到，“新主義之萬不可不研究也”，一言以蔽之，“儒教主義者，自由平等之仇敵也，在開明進化之世，不能以之為社會之法也”。這裏所謂的新主義，即是指“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所以緊接著又表示，“莫若播種自由、平等之新主義，以一變社會之思想。”<sup>71)</sup> 楊度《〈遊學譯編〉敘》也曾論述各種“主義”，文章寫道：

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思想橫溢，沛然如驟魚之下，或主唯神論，或主唯理論，或主唯心說，或主唯物說，或主天賦人權說，或主世界主義，或主個人主義，或主實利主義，或主感覺主義，各挾其專精獨到之理論，以爭雄於學界，因而彌及於社會，形之於實事，使之有日進千里之勢，以成今日之文化。

67) 兩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新民叢報》第28號，1903年3月。

68)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374。

69) 梁啟超：《破壞主義》，《清議報》第30冊，1899年10月15日。

70) 梁啟超：《答客問》，《清議報》第33冊，1899年12月23日。

71) 大井憲太郎著，馮自由譯述：《自由略論》，《開智錄》“改良第一期”，1900年12月21日，此據陳匡時整理校點《開智錄》（上），見《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4輯，頁339—43。

甚至闡明小說意義時還提到，“其有以《西遊記》活潑不羈之自由主義，《水滸傳》慷慨義俠之平等主義，而為《三國演義》競爭劇烈之獨立主義乎？”<sup>72)</sup>凡此種種，都令我們對那個時代的讀書人所使用的“主義”印象深刻。

從語彙的製作方式來說，中文世界流行的“～～主義”與前面討論的“～～界”可謂大同小異。值得重視的是，在“主義”氾濫的年代，種種“主義”的浮現，多少有些隨意性，但對一些“主義”，卻有明確的闡述。梁啟超在《干涉與放任》這篇文章中，就表達了對此的理解，而且是基於“治術”加以思考：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個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為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于生計界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為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下半，為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

有意思的是，梁啟超言干涉主義，點出了與之同名的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指出“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而“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梁甚至明確表示，“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能盡也。”<sup>73)</sup>

在上述由“主義”所營造的氛圍中，可以看出，“主義”流行涉及的是中國思想界對世界歷史進程的把握，並參照此探討中國未來的改造方向。通過“收拾西方學理”，頗為關心在“國家與個人”及“國家與社會”間尋求一種新的安排。<sup>74)</sup>只是立足點不免有差異，既有將國家之重心置於負責任之“國民”，也不乏文章從分權角度思考此問題。正是這樣的思考，“～～主義”實際成為選擇的樞機所在。

通過梁啟超大致可以瞭解，約在1901年前後，“國家主義”、“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等，

72) 楊度：《遊學譯編》敘，《遊學譯編》第1期，1902年11月。

73) 梁啟超：《干涉與放任》，《新民叢報》第17號，1902年10月2日。

74) 1903年《大陸》雜誌刊登的文章則明確界定“國家也者，個人之集合體也，社會亦個人之集合體也”，“邦土、住民及主權之三要素具備，而始成國家。”（見《中國之改造》，《大陸》第3、4、8期，1903年2、3、7月。）而胡漢民也撰文指出，“二千年來，政界沈沈，更無進化，內力茶弱，至為他族陵逼者，可綜括為二大原因：一曰不知個人之有自由獨立，二曰不知機關之性質。”因此，“欲明國家之性質，其最重者為分子團體之關係，而吾國政界之蒙昧，亦於此點為最甚。”（見胡漢民：《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民報》第2期，1905年11月。）

差不多同時在其文章中出現，而他的選擇是清楚的。1901年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中，梁就指出，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其犖犖大者約有：過去分別是“家族主義時代”、“酋長主義時代”和“帝國主義時代”；現在為“民族主義時代”與“民族帝國主義時代”；將來則是“萬國大同主義時代”。顯然，梁是青睞於民族主義的，不僅指出“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還強調“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凡國而未曾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因此“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sup>75)</sup>在另一篇文字中，梁說得更清楚，“夫平准競爭之起，由民族之膨脹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脹，罔不由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而來。”“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sup>76)</sup>

這多少意味著“主義”浮現於中國，包含著晚清讀書人所做的選擇，民族主義及國家主義也構成了當時思想的主導。許多文章都在展開相似的論證，《江蘇》雜誌的一篇文章，在道明“吾國實有由專制而變為民主之大希望”的同時，也闡述了落實此一希望的具體步驟，“欲達此莫大之目的，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統一大群之主義，使臨事無渙散之憂，事成有可久之勢。吾向者欲覓一主義而不得，今則得一最宜於吾國人性質之主義焉，無他，即所謂民族主義是也。”<sup>77)</sup>由此也可以解釋，何以“自由主義”沒有得到更多的闡述。最基本的是，對“主義”是有高度選擇性的，如何選擇則決定於中國適時的需要。如《大同日報緣起》就表示，“民族主義尚不暇及，何論於社會主義。”<sup>78)</sup>這典型反映出當時確立的基本論式，揭示出“自由”難以成為“主義”的緣由。

換言之，“自由”難以成為“主義”，是因為其未能構成時代的主題。不乏文章在把握世界大勢時，具體區分出不同時代實面臨不同的問題。如在《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這篇文章中，作者就明確表示：

近百年來，歐人之愛自由心最重，其鼓大風揚大浪於世界者，皆出此一念。故十九世紀政治上之競爭，則可代表其愛自由心最重之時代。其以前則愛生命心最重之時代，其以後則愛財產心最重之時代也。蓋三者之關係於人身有輕重，故其愛之有先後。野蠻之世，人類謀保其生命之不暇，則愛自由之心輕；近百年來，謀保其自由之不暇，則愛財產之心輕。故法律未生以前，無重大之自由問題；立憲政治未立以前，無重大之財產問題。今也，民刑諸法條理井然，鮮生命之憂，立憲政治，許可權厘然，鮮自由之憂，於是乎合全國民之心力，而盡力乎財產。<sup>79)</sup>

75)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清議報》第94、95冊，1901年10月12、22日。

76) 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5號，1902年4月8日。

77) 競齋：《政體進化論》，《江蘇》第1、3期，1903年4月、6月。

78) 《大同日報緣起》，張枏、王忍之前引書，《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頁368。

79) 兩塵子：《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1、14號，1902年7月5日、8月18日。

這裏的意味是，“自由”是與特定的時代聯繫在一起的，具有明顯的“時代性”；往往是將“自由”與19世紀的“政治競爭”聯繫在一起，似乎在政治競爭的19世紀，才代表“愛自由心最重之時代”。梁啟超也持差不多的看法，《新民說·論自由》就寫道：“‘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對自由的評價不可謂不高，然而，問題轉變為“自由之義”是否“適用於今日之中國”，卻有了不同的答案。這實大有樞機，多少說明言“自由”而不言“自由主義”，于梁實是有充分考慮的。他將近世史中爭自由的大事，列出一年表，並分別標出“宗教上之自由”、“政治上之自由”、“生計上之自由”以及“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民族上與宗教上之自由”，實際上是將對“自由”的爭取作為“問題”而非“主義”。<sup>80)</sup>所以我們也看到，在諸多主義中，梁恰恰甚少言及“自由主義”，而更多是以“自由之義”來表示。這裏也表明，對歷史進程的理解實際上制約著中國思想界的選擇，“自由”難以成為“主義”實際上與此密切相關。而正是在這樣的安排中，“自由主義”也失落於能激起中國知識界更多熱情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

無論是“～～界”，還是“～～主義”，在中文世界的浮現，都展示出語言的選擇機制、淘汰機制。儘管其源出日語，但作為現代漢語新詞，又衍生出與其母體或許毫不相干的意義。因此，作為現代漢語中頗為特殊的“復合詞”，如何“組合”，便成為我們考察語言成長具有特殊意義的例證。“～～界”浮現於晚清中國的“轉型”年代，實際成為國家與社會形成新型對應關係的寫照。換言之，“～～界”由“虛”轉“實”並非無關宏旨，還成為把握中國社會演進的樞機所在。同樣性質的“～～主義”等語詞，在現代漢語中留下的諸多痕跡，也未必與其語源有什麼關聯，所體現的是中國社會的取捨。

本土因素會作用於這類語詞的成長，本不足為怪，重要的還在於，在中日之間頻繁交流，尤其是漢字新詞創制的時期，兩個國家本處於不同的社會形態中，相應的，與社會密切相關這些“復合詞”，其接受過程，還會經歷諸多曲折。“～～界”的出現，實際成為一種象徵，預示著國家與社會形成新型對應關係後，中國社會在重新組織。事實上，所謂“～～界”，其意思既然指向社會的構成，則沒有對社會的重新認識，則負載於其中的詞也難有生存的空間；而更多流行“～界”等語詞，既與語言本身有關，還與中國社會過去的組織形態有著密切的關聯，相應的，結合中國社會所呈現的“語境”關注漢語新詞的接受過程，也頗為必要。而結合本土的情況檢討漢語新詞的運用，也能發現其所展示的有別於“語源”的特質，“～～主義”就留下晚清社會如何選擇的例證。當然，僅局限於此，仍顯得很不夠，尚須對“社會”等關聯詞進一步分析，才能更好闡明“語詞”的意義。這或許需要在別的文章中加以檢討。

---

80) 梁啟超：《新民說·論自由》，見《新民叢報》第7、8號，1902年5月8、22日。